

新博物学译丛

NEW NATURALISTS 新博物学家

[英]彼得·马伦○著 周琼○译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新博物学译丛

NEW
NATURALISTS
新博物学家



[英] 彼得·马伦 著 周 琼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博物学家 / [英] 彼得·马伦著; 周琼译.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1

(新博物学译丛)

ISBN 978-7-5352-9313-8

I. ①新… II. ①彼… ②周… III. ①博物学-英国 IV. ①N91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2001 号

编 著 [英] 彼得·马伦 著 周 琼 译

总 策 划 何 龙 何少华

执行策划 彭永东 刘 辉

责任编辑 曾 菡

装帧设计 胡 博

封面绘图 林 轩

出版发行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13—14 层)

邮 编 430070

电 话 027—87679468

网 址 <http://www.hbstp.com.cn>

印 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430223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1.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20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找本社市场部更换

总 序

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对博物学的需求自然会增强。现在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博物学无一例外均很流行，博物类图书品种多样、定价不高（印数大，成本就降下来了）。中国也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理论上博物学和博物类图书也会有不俗的表现。但博物学在中国的“复兴”不会自动到来，需要大家做细致的工作。多策划出版与博物相关的著作，是延续历史、引导公众博物实践的好办法。一阶博物需要与二阶博物配合起来，后者需要学者做出贡献，从理论、历史、文化甚至社会组织的角度阐发博物学文化，从而更好地引导一阶博物实践。打个比方，简单地讲，一阶工作相当于场下踢球，二阶工作相当于场外评球和教练指导。

译名与辨义

博物学属最古老的学问，世界各地都有，它包含大量本土知识及未编码的知识。前面用到“复兴”两字，也是暗示中国古代并不缺少博物的实践和文本。相反，我理解的中国国学应当包含大量的博物内容。中国古代的学问，绝大部分属于博物的范畴。这有不好的、无用的一面，也有好的、有用的一面。长期以来学者更多地看到了其不好的、无用的一面。

现在讨论国外的博物学，少不了要考虑名词的对照。对应于“博物学”的英文是 natural history，它来自一个拉丁语词组，又可追溯到一个古希腊语词组。其中 history 依然与古希腊时的古老用法一样，是描述、探究的意思，没有

“历史”的含义。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其大弟子特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的《植物研究》(*Historia Plantarum*)均如此。直到今天，英语单词 history 也仍然保留了“探究”的意项，也就是说不能见了这个词就顺手译成“历史”。

在培根(Francis Bacon, 1561 — 1626)的年代，情况更如此，比如培根用过这样的短语 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意思是自然状况下的探究(即博物层面的研究)和实验探究(大致对应于后来的控制实验研究)。在这两类探究的基础上，培根设想的 natural philosophy 才能建立起来。而 natural philosophy 大致相当于他心目中真正的学问或者科学，严格讲也不能字面译成“自然哲学”。在培根的《新工具》中 natural history 共出现 19 次，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 共 3 次，natural philosophy 共 23 次，natural philosopher 共 1 次，natural magic 共 5 次，science 共 102 次。如今个别人把 natural history 翻译成“自然史”，不能算错，但有问题。一是没有遵照约定俗成的原则，在民国时期这个词组就被普遍译作博物学了。二是涉及上面提到的问题，即其中 history 并不是“历史”的意思。北京自然博物馆(Beijing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不能叫作北京自然史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Shanghai Natural History Museum)不能叫作上海自然史博物馆；伦敦自然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不能译作伦敦自然史博物馆，但可以译作伦敦自然探究博物馆，只是啰嗦了点。

当然，并非只有中国人对这个词组有望文生义的问题。斯密特里(David J. Schmidly)在《哺乳动物学》杂志上撰文指出：“人们接触 natural history 的定义时，马上就碰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natural history 中的 history 与我们通常设想的或日常使用的与‘过去’相联的这个词，很少或者根本不搭界。当初用这个词时，history 意味着‘描写’(即系统的描述)。以此观点看，natural history 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描写，而 naturalist 则是那些探究大自然的人。这恰好是历史上人们对博物学的理解，本质上它是一种描述性的、解说性的科学。”(*Journal of Mammalogy*, 2005, 86 (03): 449—456)

此外，又有国人指出，博物学是日本人的译法，所以最好不用。日本人的确这样翻译，但这并不构成拒斥它的重要理由。现代汉语从日本人的西文译名中借鉴了大量词语，如伦理、科学、社会、计划、经济、条件、投机、投影、营养、保险、饱和、歌剧、登记等，其中许多甚至是今日中文媒体上的高频词。谁有本事，不用“科学”和“社会”这样的词，我就同意放弃“博物学”这样的词！

说到底，翻译常常是从本地文化中寻找意思相近的词语略加变化来指代外来词语。中外名词对照是约定的，只有相对意义，翻译是近似“可通约的”。我并非主张 natural history 只能硬译成博物学，根据上下文也可以译作博物志、自然志、自然探索、自然研究等，甚至译成“自然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即可。

动机与策略

我关注博物学有科学哲学的考虑（涉及改进波普尔的“客观知识”科学观、博物致知、波兰尼意义上的个人知识等）、现象学的考虑（涉及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与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科学史编史学的考虑（涉及博物学纲史纲领），也有生态文明建设（涉及人类个体与大自然的对话、伦理上和认知上认同共生理念等）的考虑。别人关注博物学，可能有其他的考虑。博物学具有相当的多样性，人们对博物学的看法也千差万别。这都很正常，不妨碍反而有利于当下博物学的复兴。

博物学与科学显然有交集。历史上大量例子可以印证这一点。但是，博物学与科学的指称、含义、范围，从来不是固定的。不同研究者，依据不同的理念、编史纲领，可以有不同的界定和划分方案。有人认为博物学只是科学的初级阶段；发展到后来，博物学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当然是不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无意完全否定这些想法、方案，但我不愿意用这套思路看问题。

在我看来，博物学与科学的确有密切关系，但从来没有完全重合过，过去、现在如此，将来也不可能。博物学也不是科学的真子集，实际上不是、理论上也不是。人们可能喜欢把一些博物的内容算在科学的大旗下，这不过是科技强势后人们的一种本能习惯。这与把科学视为博物名号下的活动一样，有缺陷、令人难以接受。就当下的形势而论，博物学与科学相比，显然前者无用、弱小、肤浅，我更愿意把博物学大致定位在“科学边缘的一堆东西”。用词不雅，并不意味着我不看重它，相反我认为它非常重要、想做各种努力复兴它。博物学处于边缘，那是因为科技与现代性为伍、相互建构，边缘不可能与主流争宠。如果博物学在今天已经是主流，我犯不着再积极为之呐喊。还有人喜欢把博物算作“科普”的一种形式，我更是不以为然。两者的动机、目标差别较大。但我不反对从博物的眼光改进疲惫的科普，甚至认为主流博物类科学应当优先传播（因为它们与百姓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科普在当下政治上正确，在年轻人看来却可能与时尚无缘。而博物却越来越可能成为一种时尚！这种大格局不是某些人能够完全改变的，当然在细节上可以做点花样，稍稍改变一下速度。

我主张博物学与科学适当切割。这一主张曾在一些场合报告过，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反对者认定我拒斥科学、与科学对着干，其实是误解了我的动机。我讲得非常清楚，博物学的发展必须广泛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对新技术也要多加利用，比如因特网和无人机。但是，运用科技成果，并不意味着要成为科技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要受人辖制。比如，文学、美术也要用到科技，但它们没必要成为科学门类下的东西。博物学涉及的自然知识相对多些，但也没必要成为人家的仆役、偏房。博物学要运用科技，同时也要批判科技！这不矛盾吗？的确有矛盾，但是这样做是合理的、必须地！

适当切割的好处是，切割可以保护弱者。阿米什人如果不采取与“外界”适当分离的策略，他们独特的文化早就灭亡了。博物学与科技关系更密切些，如果不适当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就会被同化、取代或是消灭。就获取知识而言，科技被认为最有效、最有组织性，依据向下兼容的推测，博物学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了。而我们的看法并非如此。博物学中相当多的部分不可能划归为科

技，一方面是科技不喜欢它们，另一方面博物学家也可能不愿意凑热闹、与狼共舞。哪些部分不能划归？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博物学很在乎的一些主观性较强、情感上的东西，而它们不大可能被科技认可。博物学非标准化的致知方式（ways of knowing）也与科学方法论相去甚远。博物学的动机、目标与当代科技差别很大。

切割也能降低准入门槛。在现代社会，科技是一类特殊的职业，从业者需要接受专业训练，通常要有博士学位。而博物学不可能也不需要这样。郊游、垂钓、种菜、逛集市、观鸟、看花、记录花开花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等都是博物学活动，人们非常在乎其中的情感与体验。一般不能说这些是科学活动。大致说来博物学家可分为职业和非职业两大类。前者更专业些，靠博物类工作吃饭，后者则不是这样。前者与科学家身份较接近，甚至就可能是科学家，也有不是的（比如从事自然教育的专业人士）；后者大部分是普通百姓。普通百姓从事博物学，不一定就不专业，也可以非常专业，甚至比职业科学家还专业。普通人可能舍得花时间，仔细琢磨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心态平和，不必总想着弄经费、用洋文发论文。

适当切割后，博物学成为普通公众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们不能把赌注都压在某一绩优股上。这样讲并不是说普通公众可以不理科技了，只相信自己那一点可怜的东西。不是这样。而是在兼听各种声音（包括科技）的基础上，公民修炼博物学自己可以有感受、理解大自然和社会的另类（也可以说是特别的）进路。公民在综合了这些信息后有可能对事态、事件作出一个行为主体（agent）的独立判断，而不是事事、处处只听权威的。

降低门槛后，博物学将成为普通公民的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认知方式、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仿此，可以讲“博物自在”：通过日常博物，“我”知道自己存在，“我”设法“好在”。

最近国内许多出版社开始对博物题材感兴趣，这是好事。但也不宜一窝蜂上马，一定要讲究速度和节奏。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何龙社长跟我谈起出版博物学图书之事，我曾建议先从英国柯林斯出版公司的“新博物学家文库”（The

New Naturalist Library 也称 *The New Naturalists*) 选择一部分引进, 这是一种简便的方法。毕竟人家坚持了半个多世纪才出版了一百来部精品博物学图书, 原作的质量是有保障的。当年许多读者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知名的科学家, 这套图书影响的自然爱好者不可胜数。条件成熟时, 中国的出版社一定要推出国内原创的、中国本土博物学著作。

刘华杰

2015 年 11 月 10 日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再版自序

值此“新博物学家”丛书出版 60 周年之际，“新博物学家”丛书再添“新”作。本书首版于 1995 年，仅仅 2 年便售罄，同近来绝版的大部分书一样，即便是二手的，也是一书难求。新版中我对书的内容做了大量修改和增加，新增一章主要记载了过去十年间发生的大事，还有更多内容正在筹备中。过去十年中所发现的错误无论巨细我都做出了修改（参考书目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都需要精确），并在原版内容的基础上添加了许多注解。附录内容也做出了大量更新，部分还进行了重写，包括丛书近十年来涌现出的所有作者的传记。再版后记是约翰·赛克斯写的一篇简短诙谐的故事，首次刊载于“新博物学家”读书俱乐部新闻通讯，经编辑罗伯特·伯罗授权，作为本书再版的后记。原版的彩色封面也已更换，采用了罗伯特·吉尔默设计的封面，他从 1986 年便开始为精装本设计封面。对我而言，修订本书是一个非常愉悦的过程，希望它也能给各位读者带来同样的快乐。

在此，我仍然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我想感谢新加入丛书的作者，感谢他们愿意将自己多年辛苦研究的成果凝练为我笔端简略的数行，感谢他们乐于分享自身经验，为丛书再添新作，他们是约翰·阿特宁阿姆、特雷弗·毕比、大卫·卡伯特、奥利弗·吉尔伯特、理查德·格里菲思、彼得·海伍德、大卫·英格拉姆、安德鲁·拉克、约翰·米切尔、布赖恩·莫斯、德里克·拉特克利夫。感谢以下诸位，在他们热情的帮助下，首版中漏掉的部分丛书作者在此得

以填补，他们是简·布赖特女士（补充德里克·弗雷泽）、吉米·丘伯博士（补充J. W. 琼斯）、卡洛琳·金博士（补充哈里·汤普森）。鲍勃·伯罗是泽西新博物学家书店的负责人，他就再版书价问题向我提出了一些建议。经约翰·赛克斯允许，我对他生动有趣、想象力十足的小故事做了少许修改。撒克逊有限公司的西蒙·阿普尔顿耐心细致地向我解释了彩印会遇到的各种问题。迈克尔·马耶鲁斯则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撰文维护埃德蒙·布里斯科·福特，近来后者因一本大幅修订的书而饱受诟病。除了重新设计精美的封面，罗伯特·吉尔默对于本书再版做出了大量贡献。斯蒂芬·布克扎基本人的书作即将收入“新博物学家”，“新博物学家”丛书，同时也是丛书一直以来的忠实粉丝，欣然为本书作序。最后，我还要感谢迈尔斯·阿奇博尔德同意再版并审定修订后的书稿；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海伦·布洛克赫斯特一直关注本书直到其面世。尽管面临种种困难，“新博物学家”丛书始终不忘初心——再版一定会更上一层楼。毕竟，科学的思想是不朽的。

彼得·马伦

拉姆斯布里

2004年9月

目 录

001/1

新博物学

006/2

一顿午餐的收获

014 编辑部增员：约翰·吉尔默和
达德利·斯坦普

020 作品与作者

027 工作中的编辑

033 “新博物学家”丛书编辑部
会议

040/3

“自然之美”

044 关于摄影师

048 关于作品作者

053 分工拍摄

055 如果一开始你没有成功

059 彩色与批判

063/4

图片：“新博物学家”丛书的封面

065 克利福德·埃利斯和罗斯玛
丽·埃利斯

072 埃利斯：旗帜

094 后记：吉尔默封面

097/5	109	《蝴蝶》的撰写和插图
E. B. 福特与《蝴蝶》	116	畅销书
	120	《飞蛾》
	122	福特的晚年时期
128/6	142	国家公园与地区博物学
风格问题	148	合著
	153	丛书不断完善
165/7	166	童年时期的新博物学家
众博物学家	174	教师和苔藓采集者
	184	环球探险家
	193	弗雷泽·达林和莫顿·博伊德：苏格兰 60 年间的博物学发展
202/8	205	自然历史经典之作的诞生
专著：研究单一物种	210	专著
	214	悲剧的《蚂蚁》
	217	特别卷
	222	热衷鸟类
	231	科学事业的交接
	241	后记
247/9	247	遗失的杰作
失意的作者，未出版的书	251	软体动物、湿地和其他缺失
	255	《新博物学家》

	256	丰塔纳平装本
	259	“乡村博物学家”和乡村系列
	262	布卢姆斯伯里精装本
265/10		
遭遇危机，渡过难关		
273/11		
自然保护与新博物学		
285/12		
十年以来		
	286	2005 年的《新博物学家》
	291	著述《新博物学家》
	297	“地方著作”（外加一些动物）
	304	作者说……
	307	一本书的故事
	315	1995—2005 年《新博物学家》
		封面
324/参考文献		

1 新博物学

大概 14 岁的时候,我在学校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被翻到卷了页角的《蝴蝶》,这是我拜读的第一本“新博物学家”。尽管书的封面被摸得皱巴巴、脏兮兮,但封面的图片却让我眼前一亮,它跟我读过的其他任何博物学书的封面都不一样。书中的内容则更有意思:彩色插图处处可见,文段读起来津津有味,详细记载了各种蝴蝶的变种和畸变,这都是大自然的杰作。但是,除了那些有意思的内容外,书中还有一些关于繁殖的章节,其中涉及的均质结合体、对偶基因和多态性等概念颇令人费解。对于类似章节,我就跳过去了。

一两年后,我又得到了一本萨默海斯的馆藏版《英国野生兰花》,对我而言,这本书简直是完美至极。后来我努力攒钱希望能买一部单反相机,一心想着拿它模仿罗伯特·阿特金森去拍摄兰花。更妙的是,乔布·爱德华·劳斯利的《白垩及石灰岩上的野花》绝版多年之后,重又再版,依然广受欢迎。为了追寻劳斯利的足迹,我带着相机遍访多佛白崖、佩恩斯威克灯塔、埃文河峡谷和贝里海角,那一两年我对拍摄野生花卉近乎痴迷。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当时那个年龄我应该喝喝小酒、追追漂亮姑娘,但我并不后悔,也不觉得这是萨默海斯和劳斯利的不是。是他们的书带给了我从别处无法找寻到的灵感,书中描绘的都是我喜爱的东西,有四季更替的乡村风光,有隐匿在田间地头的村落,还有一些离奇又有趣的自然现象:找不到配偶的黄蜂寂寞难耐,硬是和兰花凑成了一对;白色岩蔷薇的花蕊却是黄色的,稍一触碰便展开好似风扇;还有那神秘的虎舌兰,终其一生或许也只会盛开一次。

书尾清单中列举了卷帙浩繁的丛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及至毕业,我拥有了清单中至少三分之一的书。其中有好些书我一直没能读懂,但大部分同大学教

科书、指南之类的书比起来让人耳目一新,有时不禁会想为什么其他的书不能如此。

25年后,我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已经明白为何世上只有一套“新博物学家”。一般人未必愿意去冒险编撰这类大部头丛书,即使他愿意,时机也不见得合适。“新博物学家”丛书的出现是因为其创始人希望汇编一套与众不同的书,为博物学书籍出版设定一个全新的标准。“新博物学家”之所以能顺利发展至今,其原因有二:首先,作为相对较新的学科,生态学走向“成熟”,这不仅让一直以来杂乱无章的实地研究形成了体系,还催生了观察理解自然的全新途径。生态学是一门关于生物同其所在的不同环境(食物、避难所、洞穴、巢、空气、水和岩石)之间关系的学科,是实地研究让生态学变成了一门可以量化的学科,生态学也因此备受推崇。其次,摄影技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美国柯达公司引领的这次革新,让摄影技术娴熟的博物学家能够首次使用彩色图像记录大自然,也改变了博物学家及出版商承袭多年的习惯。他们无需再用针插、填塞、按压等方式将蝴蝶、鸟或花制作成标本,只需在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中去记录它们。

时代背景或许有利,但没有合适的专家乐意组织编写“新博物学家”并四处拍照,这一丛书的存在或许不会超过五年,更别说到目前为止已发展了50年。“新博物学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此。1945年,众多的专职及业余博物学家不仅精于某个学科,还能够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任何受过较好教育的人都能够读懂。其中部分人已经出过很受欢迎的书,或通过接受广播、采访、撰写报纸自然专栏而为公众熟知。有一个人特别要提到,那就是朱利安·赫胥黎,他不仅是一位才华卓著的科学普及者,还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出版商W. A. R. 柯林斯的商业资源同赫胥黎的才华相结合,奠定了“新博物学家”成功的基石。柯林斯能将书推向市场,赫胥黎则能找到适当的作者。此时,恰好这一领域学术水平最高的作者愿意而且有能力写出让他们两人都满意的书。

但是,这样的书会有市场吗?“新博物学家”丛书涉足了出版界的未知领域。其他的出版社似乎确信这是一趟浑水,而柯林斯也一定认识到了此举的商业风险,尤其是在摄影和编辑上投资不菲的情况下,风险越发难以预测。然而,第一批

书的销量却让他喜出望外。1945 年的读者有些独特的共性。即使在战争期间,书籍的出版也能满足他们的阅读期待。但是,当时鲜有书籍使用彩印(柯林斯出版社推出的《图说英国》除外),而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乡村漫步,欣赏花鸟的机会也实在有限。“新博物学家”丛书给战后英国的书店带去了色彩。那时的人们对自然的兴趣极高,而且那时也没有电视机来帮他们打发时间,因此,他们选择读书。他们读书时注意力更为持久,对成人教育兴趣浓厚。社会上也设置有专项基金鼓励退役军人通过自学成为学校教员。科学知识的普及在这一阶段已达到了巅峰,试想谁不曾被先进的战争武器把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被可怕的原子弹夺去一切?所以,人们对于和平未来的期望也前所未有的强烈,他们希望未来城镇有更多绿色的空间,山间有更多的国家公园。丛书的成功,一定获益于这种期待。二战后,“新博物学家”和实地研究及自然保护的同步发展绝非偶然,二者都是大众切身需要的产物。“新博物学家”的成功是“天时”的结果,由于丛书的市场定位的关键在于其收藏价值,第一批图书的大获成功为后一批图书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W. A. R 通常被人称作比利·柯林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体型来讲他高大健壮,他言辞诙谐、眼光敏锐、眉毛浓密,他豪放不羁、性格直率,可以说是个急性子。三个无与伦比的特质让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出版商:首先,他是一名狂热分子;其次,他对于细节的注意几近痴迷;最后,他对自己和同事都极为严厉。据说,即便是在周末,他也会忙于农艺、狩猎和园艺,最重要的是,即使是周末,他还坚持阅读书稿。作为那种墨守成规似的老派出版商,他会毫不含糊地去读书。

他是比利·柯林斯家族第五代传人,柯林斯家族的第一代先祖是格拉斯哥的一位校长,于 1819 年创立了一家宗教及教育书籍印刷厂。20 世纪 30 年代,当他的玄孙接手家族企业时,柯林斯公司仍旧是一家印刷信纸、日记簿和圣经的公司,而非出版社。公司因出版博物学方面的著作和小说而声名鹊起,这主要归功于比利·柯林斯。比利·柯林斯于 20 世纪 20 年代进入公司,他的兴趣完全不在印刷方面,反倒是对伦敦极具诱惑力的出版业兴致盎然。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熟谙国际图书市场的运作之道。英国人物传记辞典中给予了他这样的评价“世界图书